

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蒋述卓 主编
李凤亮 副主编

批评的 文化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批评的文化之路/蒋述卓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6

(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ISBN 7-5004-4168-1

I. 批… II. 蒋… III. 文学—关系—研究 IV. I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6544 号

责任编辑 刘三华

责任校对 郭娟

封面设计 任菊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347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31.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蒋述卓

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评的兴起，是 20 世纪末全球学术界一个令人瞩目的景观。值得说明的是，“文化研究”一词在当下学术语境中仍有一定的歧义性：就其狭义而言，它指的是 20 世纪中叶发端于西欧诸国、90 年代初陆续介绍到中国的某种批评潮流，其范围涉及大众文化、文化身份、传媒、文化机构、文化消费、权力话语、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政治阐释学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文化研究”作为涵义广泛的批评潮流的共名，本身的领域和对象变动不居，暂时也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和流派，但它在研究思维、操作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仍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借用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界一本专门性学术出版物的“前言”语，狭义的文化研究的特征大概就是它的“实践性品格、政治学兴趣、批判性取向以及开放性特点”（《文化研究》第 1 辑“前言”，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 页）。“文化研究”往往还有另一层涵义，这就是对它的广义的理解，这种“文化研究”有点类同于“泛文化研究”。就文学研究与批评而言，此类“泛文化研究”把人类历史累积的各种文化成果作为话语资源，展开对文学的多向度阅读与理解，寻绎文学活动中的文化要

素，并从更为深广的语境中赋予文学以新的质素与空间。人们对“文化研究”或狭义或广义的不同理解与运用，虽然视野悬殊，着意与归宿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我们依然可以发现二者的某些共通之处，比如对文学存在的独立性与依存性加以考察、将静止的“文本”同活动着的“世界”结合起来诠释、打破传统的学科阈限而尝试多种互阐互证……诸如此类，都在表明一个事实，即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的多元时代的来临。

毋庸置疑，文化研究的兴起有其深广的社会语境与学术渊源。20世纪全球性的学科细化，某种意义上加剧了知识的壁垒；而形式主义一脉批评论调的持久高张，虽然表面上维持了文本的“内在完整性”，却严重忽视了这一完整性得以存在的外部语境。此外，20世纪中后期，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的功能似乎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批评家们不再满足于对文本自足性的简单读解，而愈发注重揭示隐藏于一个独立文本内部的文化秘密；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的这种“隐喻性”，大大扩展了它对社会文化的解释力与干预力。批评的上述种种变化，共同唤起了文化研究的勃兴。批评的文化转向，也跟文学自身的嬗变密切相关。20世纪的中外文学，不约而同地经历了一场由杂到纯、再由纯变杂的演变：先是由杂到纯，不仅把古老的广义的人文写作划分为文史哲等不同方式，而且文学文体的分化也日益细密；20世纪后期的文学则从这种文体的纯粹中突围出来，走向边界模糊的杂文学：作家们常常把小说写成随笔，把论文写成故事，将诗歌的精神融入小说，而散文更成为一种文体跨越的实验基地。文体边界的有意模糊，文本意义的多重隐含，使得对某部作品的单纯审美分析未必完全失效，但至少已不再成为决定性的价值宣判。大众文化语境中审美分析的有限性，必然要求批评寻找其他的突破路径，文化研究便适逢其时应运而生，并日益繁茂起来。因此，当下的

文学批评，更多地是在寻找着种种边界或结合部，比如文本自身与外部语境的遇合，本质意义与阐释价值的对话，审美分析与历史视野的汇通，结构研究与文化研究的通融，等等。不仅文学走向了一种广义的“大文学”，文学批评也滑向了某种广义的“大批评”。这正符合了这个时代对话的、实践的、杂语共生的特征。

简言之，文化研究的意义，就在于从文学的角度理解文化，从文化的视野阐释文学。而这两点，正映现了狭义的文化研究与广义的文化研究入思与取意的不同视角：前者注重的是文学的阐释功能，突出的是批评的弥散性；后者强调的则是深化对文学自身的理解；换言之，前者把文学理解当做手段，后者把文学理解当成目的。我们的这套“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所着意的更多是后者，即把各种文学、诗学现象置于特定的时代氛围与历史语境中，从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中考察和透视这些文学与诗学现象，达到对其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理解。

本丛书共六册，据其内容大概分为三类。首先是两本“文艺文化学”方面的书：《文化视野中的文艺存在——文艺文化学论稿》（蒋述卓、李凤亮等著）与《批评的文化之路——文艺文化学论文集》（蒋述卓主编、李凤亮副主编）。前者是著作，后者是论文集；前者侧重于对文学意义的多重考察，关注的是批评理论，后者则侧重于批评实践。“文艺文化学”作为文艺学学科的一个新兴方向，近年来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这一研究的动机乃在于整合人文学科的既有知识，通过比较给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文学以新的定位。比如《文化视野中的文艺存在》一著即通过文艺与哲学、宗教、道德、语言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比较，既在本质上对文学的意义与价值加以重新认识，又从研究角度将文学与相关人文社会科学进行勾联与区分，目的仍是进一步理解文学与文学研究。上述内容构成该书的“上编”。而“下编”则将文

艺活动置于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考察文艺与社会风俗、社会文化心理、大众文化的相互关系,并从艺术生产角度对现代文艺的生产与消费、传播与反馈等机制进行解读,以试图让读者从更具时代感的视点体验和理解当代文艺的多元发生与基本走向。相比之下,《批评的文化之路》这本论文集的内容更为丰富庞杂一些,共收录33篇文章,编者将其分为“宗教文艺的文化阐释”、“文艺美学的文化观照”、“文学批评的文化解读”、“跨文化视野中的比较文学”、“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大众文学与大众文化”等六辑。这些论文,不仅比较了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关系,还比较了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而对几个文学批评现象的阐释,内在地贯注着文化研究的观念;对比较文学、大众文化的解读,作者们运思为文时,也大多渗透着比较诗学与比较文化的思路。总体上看,虽然论题众多,但仍可集中到几个要点;而贯通全书的,是一种在文学——文艺——文化——文明的有序递演中,为文学批评开拓文化之路的视野,这也正是该书编选者们的初衷所在。

丛书的第二类,包括两本研究中国当代文艺现象的专题性论著:《城市的想象与呈现——城市文学的文化审视》(王斌等著)和《蝶与蛹——中国当代小说成长主题的文化考察》(李学武著)。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现代化进程的逐步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随之重新启动并很快步入发展的快车道。90年代,市场经济的实行进一步催生了城市的活力,城市的规模与数量以空前的速度激增,形成极其迅猛的城市化浪潮。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化浪潮已经成为90年代最为重大的社会景观。应对于当今中国城市的蓬勃发展,城市文学与城市电影也于80年代初起步,并在对城市社会巨大变迁所作的同步叙述中,迅速走向繁荣。其中,城市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更引人

注目。在 80 年代，城市文学还只是文坛多元复调中的一种声音，而在 90 年代已然处于十分显要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整个文坛的主流。相比较而言，城市电影的发展势头相对较弱，但它无疑也是 90 年代影坛中十分重要的一支。《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一书，在深广的层面上，对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城市文学与城市电影的审美流变进行了剖析，对其文化内涵进行了揭示。尽管有些地方略显单薄，但是通过它们，可以使我们对于当今城市社会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并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奠定了有效的基础。《蝶与蛹》一书选取的则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个重要、但尚未获得重视与充分讨论的论域：成长主题和它在文学文本中的丰富而复杂的呈现方式。“成长”是文学中一个古老母题，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和蔚为壮观的文本序列；但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它被深刻地内在于革命文化内部，因而也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和面貌，并随着中国社会的变迁而改变着。《蝶与蛹》正是通过对古老成长主题形态的梳理，细致分析了当代中国文学中成长故事的几次变奏。它既是对当代文学中成长故事这一母题的深入研究，又在一个点上展示出当代文学史的一个侧面。在对中西方成长小说创作的分析中，该书涉及文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纵横捭阖，形成了相当完整的论述结构。十分难得的是，该书在母题研究和文学史研究两个方面建立了自己独特的观察、思考与分析的视点，同时保持着对文学文本的敏锐观察和感知；研究体现了一种值得提倡的良好方法与作风，即：既从文学实践（创作及与创作有关的文学生态）出发，不断走向理论；又以理论为依据，阐释和把握现象，不断深入文学实践。因此，在以深度分析和理性把握取胜的同时保持了丰富的审美分析，从头至尾都体现出一种可贵的有意味的“可读性”。

丛书的第三类是两本涉及文学（文学批评）现代性问题的著

作：《沉思与怀想——对话、想像与批评的现代性》（李凤亮著）和《文学彼岸性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彼岸性问题的一种文化哲学阐释》（胡志颖著）。《沉思与怀想》是作者的一本论文集，作者将所收文章分为四辑，大体可看出他近年来的学术兴趣：第一辑“存在的沉思”是作者对法籍捷裔小说家米兰·昆德拉的一组散论。作者对昆德拉颇有解读之趣，完成过一个省级的规划项目，目前又在主持一个“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辑中的八篇文章，内容分别涉及作家评传、翻译研究述评、作品分析、争鸣探讨等，与作者业已出版的《对话的灵光——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和即将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诗·思·史：冲突与融合——米兰·昆德拉小说诗学引论》构成了一个昆德拉研究系列，显示了作者对此一领域的开拓之功。第二辑“话语的寻索”通过对一些重要作家、批评家的分析，探讨了对话理论、新批评、比较诗学、人文启蒙与现代性反思等思想与学术话题。第三辑“批评的批评”是作者对几位广东批评家的解读。由于对象的熟稔，这一解读对当代岭南文学批评特征的揭示是生动而到位的。第四辑“城市的怀想”借助于对城市文学与文化现象的观察与表达，反映了作者对都市文明的考量与思索。该书作者熔理性沉思与感性怀想于一炉，从几个不同角度进入文学批评现代性的反思和言说，显示出一种较为可贵的理论勇气。特别是该书的诸种话题不同程度地围绕着“对话”、“想像”等充满现代性意味的关键词来展开，可以使我们感受到作者对思想话题敏锐的捕捉力和独特的人思理路。据我所知，作者目前正以“文学批评现代性”为论题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相信假以时日，应能在这方面推出更加集中与深入的研究成果。《文学彼岸性研究》是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的一部论著。作者将“彼岸性”视为中国古典文学的某种精神终极，将其置于一种

非常规的语境中加以探讨，认为“彼岸性”永远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精神领域。作者旨在阐明，中国古典文学（包括文论）中的某些作品，实质上是在现实中所达到的高居一切之上的境域。显然，作者并非一般性地再论文学的审美品格，而是通过文化比较揭示中国古典文学，在其他非汉语文本始终未能达到的“神圣”和“虚无”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卓尔不群。这无疑向传统文学理论提出了一个异乎寻常、在非审美（非常规）情境中展开的文化哲学问题。这个问题或许能为探索中国古典文学的本质意义，以及研究文本创作和阅读经验提供新的借鉴和启示。

丛书的作者们大多是高校的年轻学人，他们的文学见解与思想述说，也许还称不上十分成熟老到，却显示出独立的思想姿态与新锐的批评精神。我觉得对于当下的批评建设而言，这种姿态与精神是甚为可贵的。

文化研究目前方兴未艾，它有着广阔的空间与前景。我希望这套“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能引起学术界同行的关注与批评，从而有效地加入到“文化研究”的广泛对话之中。当然，对于我们自身而言，这套丛书的出版，只是我们开展相关研究的一个起步，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加入到这个不断更新的研究领域中来。

2003年2月于暨南大学

走文化诗学之路（代序）

蒋述卓

文学批评走到了世纪的门槛边了，理应不再犹豫与彷徨。然而，1978年以来，批评在经过拨乱反正、反思、引进与探索新方法等阶段以后，现在仍然对“如何行”的问题感到迷惑。批评何为？批评价值取向何在？运用什么话语进行批评的操作？诸多问题仍然未得到解决。批评以什么形态迈过这个“世纪之槛”，就成为了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重要问题。

—

时下文坛多在讨论批评的失语问题。这种失语，我以为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指批评家面对多元化的创作找不到对应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批评，传统的批评话语，如“意识形态”、“反映生活”、“生活真实”、“艺术真实”、“风骨”等派不上用场。另一方面，持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先锋批评家们，完全操持西方的话语来批评文学，看似有语实则无语。因为：第一，他们完全套用西

• 此文原载《当代人》1995年第4期，今用以此书代序。

方的语言，让西方的语言淹没了他们的思想见解，也淹没了他们自己的语言；第二，由于他们把“技巧抬高于素材之上，把分析抬高于叙述之上，把批评家抬高于作家之上”^①，故不仅得不到大众的承认，也得不到作家们的承认。有的作家就宣称先锋派批评花样翻新，却并未深得作家之“心”与作品之“心”。先锋派批评语言与概念的“狂欢”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当剥去它们那些词藻、术语以及袭用西方的分析套路以后，却发现那些语言与概念不过是“皇帝的新衣”。

失语的产生绝不仅是一个语言的问题、方法的问题，而是一个思想与价值的丧失问题。1989年以后，文学也好，批评也好，都在逃避，都在退隐。它们逃避现实，逃避崇高，逃避理想，也逃避文化（有的虽写文化却只是猎奇）。先锋批评之所以在1990年以后，操持起西方的一套语言而驰骋文坛，正是因为当时文坛与思想界都处于价值真空的时期。面对汹涌而至的商品经济大潮和文化探索锋芒的暂时受挫，作家与批评家都陷入了困惑之中。由于缺乏理性光芒的照射、理想的指引和价值基点的支撑，只好“跟着感觉走”。丧失了思想与理性，丧失了价值选择，把西方语言作为自己的语言也就成了惟一也是合理的选择。

失语的产生，又是一个文化机制与批评系统不成熟的表现，先锋批评家大量使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话语作为自己的语言，并没有加以严格的限定以及文化的过滤与转换，很多情况下是在不确定的意义上使用的，而且把一些明显并不现代的作家也硬拉入后现代的圈子来评论，从而造成了批评的零散、分裂与自相矛

① 伊丽沙白·福克斯—杰诺韦塞：《文学批评和新历史主义的政治》，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

盾。在那一系列的批评文章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阐释系统，有的只是支离破碎的语词，模仿的文体与叙述套路。先锋批评家亦如先锋作家，模仿西方的套路和方法，制造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通货”。

我并不反对术语与理论的引进，事实上，在如今的世界，没有哪一种文化是能够独立于他种文化而存在的了。文化的交流不可阻挡，术语与理论的引进也是必然之事。然而，对外来术语与理论的引进不能不顾东西方文化背景的差异而简单地移植与套用，输入它们必须得到本土文化的认同、融合，并且有助于激活本土文化中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从而在本土语境中实现新的创造。如果引进与移植仅仅停留在理论独白的角色，而不进入本土文化的语境，这种引进与移植就很可能是昙花一现。尽管喧闹一时却难以扎下根来并长成茂树。更重要的是，引进外来术语与理论的目的必须明确，它不应该是临时的应对工具，也不是仅仅为了否定传统而作大面积的术语换代，而是为了重建自己的文化与阐释系统，包括批评系统。这也就是说，最终还是要有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话语和自己的思想。

二

于是，建立一种新的阐释系统就刻不容缓地成为我们当下重要的任务。这种新的阐释系统就是文化诗学。

文化诗学，顾名思义就是从文化角度对文学进行批评。这种文化批评既不同于过去传统的文艺社会学中那种简单的历史批评或意识形态批评，又不简单袭用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或西方人所建立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的文化批评理论。它应该是一个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具有新世纪特征、有一定价值作为基点并且

有一定阐释系统的文化批评。

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不管处在什么时代，文化必然反映出一定社会的、文化的、民族的心态、精神和品格。文化又是综合的，从综合的角度去批评文学则可避免偏执一端的弊病，如只以文本为中心的语义学批评，只从社会学角度批评的社会学批评，总会存在某些缺陷。文化诗学能带来更宏观、更广阔的视野，也会更为深刻地剖析文学。从文学批评史上看，立足于文化，站在文化哲学的角度来批评文学与阐释文学理论，总会比单一的阐述角度显得深刻很多，分量也厚重得多。如中国古代的刘勰，近代的王国维、鲁迅，西方的马克思、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勃夫，以及歌德、葛兰西、巴赫金、罗兰·巴特等。文学批评家应该兼文化哲学家。在目前的中国，恰恰缺乏的就是这种一身二任的人物。我们希望多一些文化哲学式的文学批评家，或许能使中国文学批评真正形成系统，具备大家气派，出几位批评巨人。

文化诗学的价值基点是文化关怀和人文关怀，其内涵的具体表现可分为三个层次：

1. 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作品表现出来的文化哲学观，即分析它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文化观念和文化思想。

2. 要把作品描绘的社会状态、人物命运与心态放到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去分析，揭示出作品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以及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文化心态。批评家要站在文化发展的角度反映历史，思考历史，观照当下文化的生存状态与发展趋势。

3. 要站在跨世纪的角度，着重关注作品对文化人格的建设问题。人格是文化理想的承担者，人文关怀的重点应该放在人格建设上。作品的基调、价值取向是否有利于现代文化人格的培养和建设，是衡量作品是否具有审美价值的重要标志之一。因为文

学作品审美教育的任务就是为了培养人、塑造人。江泽民提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也就是要塑造现代人格的问题。批评家要帮助作品实现这一重要任务。

在第一层次上，主要是解决一个叙述者文化立场与文化背景问题。因为我们分析作品，不仅仅是分析作者“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还要分析作者“说什么”和“怎么说”背后的文化背景，即他“为什么这么说”，“站在什么文化立场上这么说”。作者描绘一种社会生活，必然表示着他对这种社会生活的文化立场、文化观念、文化思想。作者是否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和文化根基，决定着他“说话”的深度和厚重度。

在第二层次上，主要是解决文学作品与文化背景的关系，即要看作品所描绘的社会生活是否能够复现文化或呈现文化的当下状况，并且符合当时社会状态存在的文化背景。也就是说，批评家往往要把作品当做文化的一部分来处理，将其放置在文化的大环境内去考察。斯蒂芬·葛林伯雷说过：“伟大的艺术是文化的复杂的斗争与和谐的超常灵敏的记录。”^①从文化角度去批评文学，自然会涉及文学所反映出来的文化生态环境与文化模式。

在第三层次上，主要是解决一个批评的时代性问题。批评与创作一样，都要紧跟时代。批评应该着眼于未来，着眼于文化的建设，而不是对文化进行消解，只破不立。批评作用于读者，绝不仅仅是介绍与推销，沟通与传达，更重要的任务还在于陶冶情操，宣扬理想，塑造人格。这也是批评体现文化关怀的重要方面。

^① 斯蒂芬·葛林伯雷：《文艺复兴的自我确立》，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

文化诗学的阐释系统主要在一种文化对话中来建立，这种对话包括：东方和西方的对话，现在与未来的对话，作者与大众的对话，作品与社会的对话。这种阐释系统的立足点还是文化，运用的概念、术语应该是中西方相融合的产物。这是因为，近百年来，批评理论已经很西方化了，但另一方面又不能抛弃中国文化传统，要体现出中国文化精神的内涵。如果仅从翻译西方文学批评词语而言，则尽量要做到如钱钟书先生提到的“化境”，使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真正本土化。这种本土化并不是指词语字面上的中国化，而是指词语表面上能真正体现中西文化精神的对接与融合。文化上的对话是一种出于平等地位上的对话，而不是一种侵袭和强权。词语上完全照搬不是对话。它并不能建立起文化诗学的阐释系统。由于东西方文化语境的异质，照搬的词语往往游离于本土文化之外，难有生命力。先锋批评大量搬用西方现代主义的词语，而进入不了大众的层面，就是因为没有进入中国的文化语境。如果从未来的发展来看，这种阐释系统要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也必须做到中西的融合，使其具有更强更广大的可接受性，同时这也是使中国文学批评融入世界文学理论的最佳选择。文学批评作为社会文化批评的一部分，必须具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也是使文学作品进入社会文化生活的最佳桥梁。

三

文化诗学的立足点是文化，但并不能将其等同于文化研究。它是将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文学批评的一种新阐释系统与方法。之所以称“文化诗学”，就是要求文学的文化批评必须保持审美性。这种文化批评的审美性，亦着重在发扬中国传统批评理论与方法的优势，使传统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在现代化的转化

过程中得到审美维度的再确立和审美意义的再开掘。同时，也使西方文学批评的各种新理论与方法在经过中国文化的选择、过滤与转化之后，归结并提升为审美性，从而成为文化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多用一些比喻词或意象性的概念来表述，如高古、飘逸、雄浑、苍凉、气骨等。这类批评只可意会，而难以具体言说。虽然如此，但它却可以引发读者的审美联想，具有很强的审美生发性。在文化诗学里，我们要保留这种审美生发性很强的特点，而又要用现代美学理论、现代文化理论（这些理论主要都是近几十年来从西方引进的）对其作进一步的引申和发掘，使批评变得深入、具体并具有明确的审美指向性。比如批评一位作家的散文，我们可以用飘逸、散淡去概括它，但又不仅仅停留在传统意义上的意象式表述，而是可以对其作品作深入的结构分析、心理分析乃至社会风气、社会思潮、文化原因方面的分析，力图把这种审美感受式的批评开掘得更深，使其转化成为一种文化诗学的批评。总之，我们可以在保留中国传统文化批评中整体印象式批评、诗意描述与领悟式批评等优势的前提下，建设文化诗学的理论与方法。

文化诗学也不能视为一种文学的外在批评，就在于它保持了审美性，这也是它与西方文学批评中的新历史主义区别开来的重要标志。西方新历史主义是对 20 世纪初二三十年代新批评的一种反拨，将过分注重文学内部的文本批评的趋势作了大的扭转，更多地强调对作者与社会文化、政治境遇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对作品如何被社会所接受并且参与政治与社会运动过程的研究。新历史主义着重在批评的历史——社会学取向上，离开文学审美性的趋势已很明显。因此，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文化诗学不同于斯蒂芬·葛林伯雷所主张的那种属于新历史主义

范围内的文化诗学。^① 文化诗学既是文化系统的实证性探讨与文学审美性描述的统一与结合，又是文学外在研究与内在剖析、感受的统一与结合，是西方哲学化批评与中国诗化批评的化合。

文化诗学的建立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要经过许多人的努力，并为之付出呕心沥血的实践才行。我在此文的描述只不过是一个开端与引子，它的清晰面貌与轮廓还需文化诗学的批评家们去充实它，完善它。尤其在理论术语的建设上，还需要做非常细致、扎实的工作。当然，文化诗学只是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的一种探讨，一种设想，它不可能是惟一的探讨和选择。

^① 斯蒂芬·葛林伯雷 1986 年 9 月 4 日在西澳大利亚大学作过《通向一种文化诗学》的讲演。参见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